

蘇孝林在世界範圍復活敦煌文化

有着「可移動的敦煌」美譽的中國舞劇《大夢敦煌》自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訂單不斷的世界巡演，十餘年間足跡遍及澳洲、法國、西班牙、荷蘭、葡萄牙、比利時、香港等多個國家和地區。作為第一個在上海大劇院自主售票的藝術團體，更是第一個在澳洲以商演方式取得成功的中國藝術院團，其以「多演出，多產出」成為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去的典範。該劇藝術總監、甘肅省政協委員蘇孝林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，除「復活」厚重的敦煌文化外，該劇還遵循文化產品的市場規律，按照市場方式生產和運行藝術產品，通過營銷策略開拓海外市場，實現了中國演藝產品走出去戰略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朱世強

上世紀90年代末，位於西北內陸的甘肅省蘭州市希望創作一部以敦煌文化為背景的、《絲路花雨》式的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族舞劇，並將這一重任交給了時任蘭州歌舞劇院院長蘇孝林。接到通知後，蘇孝林輾轉找到著名編導陳維亞、作曲家張千一及國家一級編劇趙大鳴等人，沿着「敦煌、絲路、多民族」方向，開始了《大夢敦煌》的醞釀和創作。

在蘇孝林的記憶中，當時的北京舞蹈學院教授陳維亞已有了《木蘭歸》、《秦俑魂》等成功作品，但這位才華橫溢的編導仍未有一台大型舞劇，他想通過一台舞劇證明自己。「我們的迫切要求與他的迫切願望一拍即合，於是共同開啟了難忘的合作旅程。」蘇孝林說。



■《大夢敦煌》上演了一場雋永的愛情戀歌。本報北京傳真



■《大夢敦煌》中的羯鼓舞，將西域民族風情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本報北京傳真

「只許成功，不能失敗」

而對於舞劇的靈魂——音樂，蘇孝林則看準了寫出《青藏高原》、《嫂子頌》等經典作品的作曲家張千一。當他輾轉找到張千一的時候，張千一對他說：「我寫的音樂每分鐘3000元人民幣，一部100分鐘的舞劇需要30萬元。」蘇孝林頓了頓回答：「給你40萬元當《大夢敦煌》音樂總監，但有一個條件：只許成功，不能失敗。」

「張千一報價的意思很明顯，就是想嚇退我們，我開出更高的費用就是想把壓力推給他。」蘇孝林如此回憶當時兩人的「智鬥」。

蘇孝林帶領幾位藝術家七赴敦煌採風。第一次，他將團隊安排在了猶如敦煌大漠古堡的一家酒店，酒店粗獷雄渾，牆上有以敦煌莫高窟為背景的壁畫，洗澡用的也是古樸的木桶。而在蘭州時，陳維亞為演員排練，一住就是三個月，張千一寫音樂一住就是45天。

音樂寫完後，張千一給蘇孝林講述音樂形象。蘇孝林看到張千一眼裡含着淚水。「現在想來，請這樣的大藝術家在蘭州苦心搞創作是對的，給他們提供了創作新作品的土壤，也為他們潛心創作提供了條件。」

兩年打磨 斬獲最高榮譽

經過兩年打磨，2000年該劇在北京首演，之後便開始了訂單不斷的世界巡演，累計演出一千餘場，演出收入過億元，而獲獎次數更是更不勝枚舉，基本囊括中國舞台藝術所有的國家級最高榮譽。

這部被西方觀眾譽為中國版「羅密歐與朱麗葉」的舞劇，將最負盛名的莫高窟和月牙泉人格化，講述青年畫師莫高前往藝術聖地敦煌，在穿越沙漠生命垂危之時，被少女月牙所救，兩人由此萌生愛意……劇中，昔日輝煌的古絲路名城敦煌被「搬」上舞台：石窟前，鑿窟工匠、市井百姓、商賈官吏、民間藝人、出資修窟的供養人……往返熙攘。既真實地呈現了古敦煌全貌，又巧妙展現了古絲綢之路多民族的異域風情。

「敦煌文化集絲綢之路、波斯文化、石窟雕塑、宗教文化、中國歷史、東方哲學等於一身，它的大氣厚重、豐富獨特以及對藝術觀眾的感染力，使其成為最具世界性品牌影響力的核心資源。從敦煌着手，對藝術生產而言有着先天的競爭優勢。」蘇孝林說。

藝術精品仍需市場洗禮

不過蘇孝林認為，再好的藝術精品亦需要市場洗禮。《大夢敦煌》的成功不僅是敦煌的成功、藝術家的成功，更大程度上是市場運作成功。「現今舞劇市場條件比較弱，尤其西北地區的市場化程度更弱，在這樣一個地方開拓市場，主要還是立足走出去。」蘇孝林說，精品是演出來的，市場是闖出來的，用一句話形容就是既要叫好，又要叫座。

該劇在北京首演後就第一個在上海大劇院自行售票，並獲得成功。「作為一部大製作的舞劇，該劇演職人員近200人，舞美設備沉重，搬運一次需三部加長大貨



■莫高窟第335窟內博大精深的壁畫和彩塑。本報北京傳真



■《大夢敦煌》藝術總監、甘肅省政協委員蘇孝林。本報北京傳真

車，巡迴演出成本非常高。」蘇孝林說，上海的成功給劇組極大鼓舞，越做越有經驗，越做越有信心。

邁出國際商演第一步

開拓國內市場的同時，蘇孝林緊盯國際市場，2005年在澳大利亞演出商不願承擔風險的情況下，他冒險出資10萬澳元聘請當地一家公司代理演出事務，在悉尼、墨爾本連演26場，收入近千萬元人民幣，成功走出國際商演第一步。此後，蘇孝林又馬不停蹄開拓歐洲市場，於2007年1月在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巡演32場，引得訂單紛至沓來。一年後又在法國、比利時、荷蘭、西班牙巡演44場，至此該劇在國外商演達102場。

「儘管我們講文化『走出去』很多年，不少團隊也在國外打拚，但很多進入了不了國外商演的主渠道，還處於文化交流和公益性演出層面，觀眾大多是華人華僑，並未真正打入西方主流社會。」蘇孝林說，《大夢敦煌》做了有益探索，所到之處都掀起西方觀眾了解敦煌文化、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潮。

借港優勢 推文化產品「走出去」

在北京首演後的第二年，《大夢敦煌》劇組就以近200人豪華陣容在香港公演兩天。「場場爆滿，演出結束後，香港觀眾全都站起來鼓掌，儘管演員多次謝幕，觀眾仍不肯離場。」蘇孝林回憶說。

蘇孝林認為，甘肅不缺文化資源，但由於很多文化產品未符合現今觀眾審美情趣而很難進入市場。香港在現代文化、藝術人才及舞台科技裝置等方面都有豐富經驗和實力，希望能與香港在現代藝術人才培养、舞台裝置的科技支撐等方面深入合作，用現代藝術和先進科技把敦煌文化裡的內

容，以不同形態打造出戲劇、舞劇、音樂等文化產品。

蘇孝林表示，作為中外文化共容的國際文化舞台，香港有着豐富的資源優勢和國際融資平台，希望各地文藝院團邀請香港藝術院團、文化公司、演出商來進行打造和公關服務，合力發揮作用，將「中國文化」產品推向世界。



■《大夢敦煌》男女主角受到國外觀眾追捧。

品牌正當其時 做大做強「敦煌舞」



■舞蹈演員演繹敦煌壁畫中的「反彈琵琶」。

上世紀70年代末，甘肅多位舞蹈家深入大漠腹地敦煌莫高窟，在「敦煌學」專家常書鴻、段文傑幫助下，用舞蹈語彙將凝固千餘年的敦煌壁畫「復活」，創排出享譽世界的舞劇《絲路花雨》。由此，自成一派的「敦煌舞」在世界舞台大放異彩，「千手觀音」、「反彈琵琶」等堪稱敦煌舞經典。

蘇孝林說，《絲路花雨》讓敦煌壁畫「活」了起來，《大夢敦煌》讓敦煌藝術有了情感力量，這兩台舞劇奠定了甘肅舞蹈在全國的地位和美譽度。如今，上海東方衛視《舞林爭霸》、中央電視台《舞出我人生》都相繼取得成功，作為《絲路花雨》、《大夢敦煌》的故鄉，發揚敦煌舞，將甘肅的舞蹈藝術品牌做大做強正當其時。

蘇孝林說，東西方文化有很大差異，與以往在歐洲演出的中國馬戲、少林功夫不同，《大夢敦煌》在歐洲獲得的成功表明，東方藝術是深受西方人歡迎的，而運用西方人熟識的舞蹈語彙這一藝術形式，很容易讓他們理解並喜愛中國文化，敦煌舞將會越來越受到中外觀眾喜愛。



■《大夢敦煌》成為中國文化產品「走出去」的典範。

本報北京傳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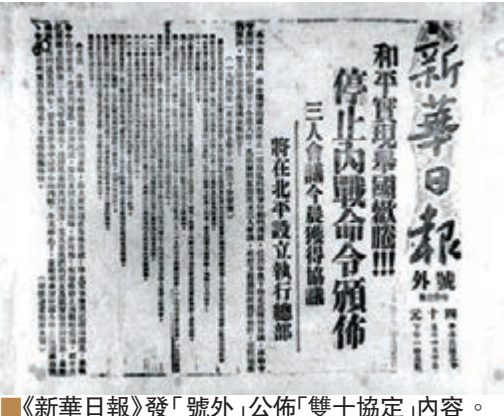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政協的「前世今生」

宿正伯

民主之花絢爛綻放



■「雙十協定」簽訂後合影。左起：赫爾利、蔣經國、蔣介石、張群、王世傑、毛澤東。



■《新華日報》發「號外」公佈「雙十協定」內容。

《雙十協定》就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、政治民主化、國民大會、黨派合作、軍隊國家化、解放區地方政府等12個問題闡明了國共雙方的見解。有的問題達成了協議，有的意見相去甚遠，在關鍵問題上並未取得實質性解決。但是，協定就舉行有國共兩黨及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，以進一步推動解決實質性問題，達成了一致。這是最重要的成果。因此，重慶談判被視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序曲。

《雙十協定》開啟了和平建國的一線曙光，也營造了寬鬆的政治氛圍。受其鼓舞，原有的民主黨派活動日趨活躍，一些地下組織浮出水面，一些新的黨派相繼成立，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齊放局面。

中國的各民主黨派，和中國國民黨、中國共產黨一樣，同樣是在中國革命的探索歷程中應運而生的。二十世紀初，特別是辛亥革命、新文化運動、五四運動前後，時局的動盪、救國興邦的責任感加之西方各種思想的湧入，催生了許多社團、黨派，中國國民黨、中國共產黨是其中最重要的黨派。

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，三民主義的理想事實上沒有被蔣介石很好地傳承，「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」的三大政策更是被徹底拋棄。影響所及，從國民黨中首先分支出堅守中山先生理想的新派別，如鄧演達、譚平山等國民黨左派組建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，後改稱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，即第三黨。此亦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之前身。

與此同時，對中國革命道路和民主進程的不同探索，也在產生新的黨派，有重要影響力的如：由張東蓀、張君勱、羅隆基等發起成立的中國國家社會黨，由曾琦、李璜、李魯之等建立的中國青年黨等。

此外，隨著中國革命的持續深入，站在某一角度，從某一側面，為着某一目的，或者專門着力於某一領域，支持和促進中國革命事業的人們，走到了一起，也促進了新黨派或黨派性組織的誕生。比如，1925年10月由美國舊金山致公堂發起成立的致公黨，隨着中日矛盾日趨激烈而誕生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（後於1945年更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），還有中華職業教育社、鄉村建設協會等。

各民主黨派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前的革命階段，都作出過一定的積極貢獻，並且隨着形勢的發展而不斷分化重組。

在政治主張上，他們與國民黨、共產黨既有通融之點，也有不同之處，勾畫了國共兩黨主張之外的第三條道路。國民黨、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認識、態度，也有過排斥、合作等不同的階段特徵。

《雙十協定》的簽訂，政治協商的前景，使得民主黨派的誕生於1945年底至1946年初呈井噴之態。1945年10月19日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重慶成立；12月16日，中國民主建國會重慶成立；12月30日，中國民主促進會上海成立；1946年春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在廣州成立；5月，九三學社在重慶正式成立。先前成立的一些政黨或被迫停止活動的政黨，也陸續改組和恢復。



連載⑤